

经济全球化的起源

哥伦布登陆美洲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打破了世界隔阂和文明分离。欧洲君主国的扩张打破了欧洲与美洲、欧洲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和美洲之间的藩篱，为经济全球化拉开了帷幕。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美洲大陆南部银矿、西非甘蔗、中国丝绸、摩鹿加群岛香料的贸易往来，以及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航线的开发。

1492年以前的世界，一直是截然不同且几乎独立的农业体系。农作物因地而植(主要是中东和中国)，其种植领域的扩展并不意味着农业的一体化。换言之，在不同农业系统间，某种类型农作物的转移虽有偶发，但其界限还是很清晰的。

1492年之后的几十年间，全球微生物实现了统一。这是一个痛苦且充满毁灭性的过程。大部分美洲大陆居民对新物种没有免疫力，一丁点的病毒或细菌就可以让他们命丧黄泉。此前，新旧大陆上畜牧业发展比重的不同，是其疾病传播态势迥异的主要原因。在旧大陆，疾病之所以能通过家畜传染给人，究其原因还是农民定居的生活方式。在地理和文化界线不明确的欧亚非地区，微生物子系统之间的壁垒早已打破。古代和中世纪的流行病，曾让欧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伤害也会强加给新大陆。

人类打破隔离状态的同时，也改变了世界语言的格局。自古以来，印欧语系广布欧亚大陆。随着印欧语系向“新欧洲”扩张，几种少数语言(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惊人扩张导致了无数其他本土语言的消亡。语言总体多样性在不断衰减，一些语系也急剧萎缩。许多语言已经消亡，有的也即将消亡。美洲印第安语、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少数人群的语言、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土著居民的语言就是这种情况。

“全球纪元的铁器时代”

近代以来的几个世纪，用埃德加·莫兰的话来讲，可以称为“全球纪元的铁器时代”。其特征为固有的两面性，即创造与毁灭相交织。从创造的角度来看，比如个人、集体和不同民族之间联系的建立，宽容原则的提出，世界上多样态文化的深度发掘，以及对精神、音乐和文学等兴趣的探索等。从毁灭的角度来看，某些文化总是自诩堪比镶嵌画中的大理石，高人一等。因此，这几个世纪里，地球上的大多数文化遭到了可怕的毁灭。少数强势文化所推崇的个人及集体欲望、价值观和精神信仰成了标准。这

一矛盾在当今世界依然存在。语言学、遗传学、人类学和考古学，为我们重构了人类生活史，同时也伴随着大多数文化样态的消亡或濒临消亡。

原子危害敲响了警钟，唤醒了多数人的良知，揭示了毁灭和单一标准终将走向虚无的深渊。由于对全球威胁的洞悉，我们对环境风险愈发敏感。1492年之后，人类种群壁垒的消除导致生态系统壁垒的坍塌，从而改变了种族及其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性质，人们对地域性的依赖变得越来越小。而今，不管你身在何地，一日三餐的食材都可以源自世界各地。

对技术重要性的宣扬导致一种错觉，即人类将永远摆脱自然。但事实并非如此。诚然，人口的愈渐混杂，对地方生态系统的依存度变小。但如今，人类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需依赖于一个庞大的全球性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物种和谐共生，相濡以沫，这也构成了人类生存繁衍的外部环境。

在全球纪元的铁器时代，人类不但破坏了残存的地方生态系统，也破坏了全球生态系统，这不仅损害了人种的多样性，也损害了整体生物的多样性。生物物种的基因遗产逐年消失，地方生态系统中微妙的平衡也随之被打破。关键问题是，对全球生态系统局部的反复破坏是否会终将不可逆转地影响其整体功能？全球生态系统具有强大的复原力、抵抗力和自我修复能力，人类的粗暴行为不可能对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更有可能的是，这些行为最终会改变全球生态系统中让人类赖以生存和繁殖的条件。这可能会形成新的平衡，这种新平衡可能有利于其他物种，而对我们人类自身则不利。

20世纪40年代，人们意识到原子能量的爆发可能导致人类灭绝。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全球变暖、土壤污染、水污染以及资源枯竭导致人类灭绝的风险成倍增加。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一直陷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我们了解了多样性、相互性、杂交性、灵活性、冗余性和个性的发展潜力。最重要的是，多样性在整个文化发展进程中彰显了创新力，即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创造过程中，当不同的思想或思维模式之间存在紧张、互动、糅合和冲突时，新事物就会冒出来。另一方面，我们还遭受着一种强迫性重复压迫。文化和生物多样性根源的破坏可能在短期（通过严重削弱人类的创造力）和长期（通过严重破坏全球生态系统）阻碍发展。因此，研究这种强迫性重复压迫的根源是当务之急。在人类进化的早期阶段，群体比个人在对抗世界方面更具优势。因此，人类（生物和文化）的发展

可能重视了群体内部的一致性，而牺牲了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类，作为遗传的受害者，则需要真正的“再人化”。人类不能通过群体之间无休止的冲突去重新审视自我，而应该从个体出发，在与多样性群体组成的大规模、广领域的全球整体性交流中重新审视自我。

。